

动辄“抽借”学生,也是权力扰民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对各级公权部门而言,组织举办某些庆典或者仪式可能是当仁不让的分内之事,纵使如此,在实际操办过程中也应该时刻注意行权的边界与分寸。否则,不仅容易事与愿违好心办坏事,还会因为扰民而损害公权部门的公信力。

有媒体报道,云南大理为筹备建州60周年庆典,从大理大学“抽借”510名在校学生参加文艺表演排练。从10月15日到11月22日州庆纪念日期间,这些被“抽借”来的在校学生将参与由州庆领导工作组统一组织的文艺节目排练,最后近十天的时间里,甚至要全面停课,全天候地投入排练与演出。

对大理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而言,建州60周年纪念日的确是个“大日子”,本着“隆重、热烈、喜庆、节俭”的原则举办一些庆祝活动无可厚非。鉴于大理大学乃当地唯一所高校,出于州庆文艺演出活动的需要,州庆领导部门有诸如参加文艺节目排练与演出之类的提议或要求,大理大学也理应给予积极主动的响应与配合。

问题出在具体操作环节。根据大理大学校方《关于组织学生

参加大理州州庆文艺表演工作方案》,此次被“抽借”的学生涉及全校五个学院,被“抽借”时间长达近四十天,其波及面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非比寻常。毫无疑问,这种“抽借”会严重伤及正常的教学秩序,导致大量的调课、停课、补课。这种教学秩序的“错乱”不仅陡增了教学管理的工作量,损耗了宝贵的教育资源,也必然会严重影响教学的效率与质量。如果出于某些原因的考量,原本理所应当的调课、补课最终被别的什么更“聪明”的办法所替代,那么,“抽借”实质上就直接跟停课画上了等号。

更严重的是,从既有报道来看,被“抽借”的510名同学实际上处于被强制状态,不仅事先没有人来征求意见,而且“所有人不得请假”。这样一来,所谓“抽借”很可能就成了违背个人意愿的人身限制,是涉嫌侵害学生受

教育权的违法行为。正如有专家所说的那样,法律虽赋予学校自主安排授课、组织学生参与社会活动之类的管理权,但其最根本的职责在于保证学生正常学习,学校不能强迫学生参与和学习生活无关的活动,更不能擅自停止学生上课。

在整个过程中,大理大学校方显得比较强势,但毫无疑问,真正强势的一方其实是大理的州庆领导机构——在“抽借”学生这件事情上,大理大学校方只不过是“上面安排”的执行人。在这个意义上,大理大学校方对在校学生与正常教学秩序的扰动其实就是大理州公权部门对学生应有权益与学校应有办学自主权的扰动,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权力扰民。

遗憾的是,类似的权力扰民似乎由来已久,至今未绝。随便上网一搜,河南洛阳千余名学生

停课冒雨为参加表彰大会的领导表演节目,福建宁德两百名学生停课夹道欢迎前来参加一次佛教“盛会”的领导,陕西丹凤三百多学生停课列队苦等参加县政府与外地企业签约仪式的嘉宾,诸如此类行政部门随意“抽调”学生尤其是小学生的“案例”比比皆是。半年前爆出的井冈山大学按照“上级机关指示”强迫学生去做群众演员的“趣闻”,更是与大理的这次“抽借”如出一辙。只是,前者迫于舆论压力被及时叫停了,而后者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

必须指出,对各级公权部门而言,组织举办某些庆典或者仪式可能是当仁不让的分内之事,纵使如此,在实际操办过程中也应该时刻注意行权的边界与分寸。否则,不仅容易事与愿违好心办坏事,还会因为扰民而损害公权部门的公信力。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要来实的

■大家谈

杨海康

近期,围绕某企业家是否涉嫌“骗捐”一事,媒体爆料、当事人回应、网上议论纷纷。且不论真相如何,这一场纷争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认识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何履行好这一责任。履行社会责任不能只是一种姿态,甚或公关手段。企业家的担当,应切合社会大局,解决社会问题,真正有益于国计民生。

当今的中国,经济规模全球居前,社会物质基础日益雄厚。经过多年打拼,不少中国企业度过了胼手胝足的初创期,有余力兼顾社会责任。有的企业家捐资助教,有的为危重病人慷慨解囊,感人事迹不胜枚举。作为一个企业家合力履行社会责任的案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SEE)很值得关注。这家由中国近百名知名企业出资成立的环境保护组织,力图改善和恢复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生态环境,减缓或

遏制沙尘暴的发生,十多年来持之以恒。如今,不少中国上市公司年报为履行社会责任辟有专门章节,有些知名企业定期发布详尽的社会责任报告。这一转变也符合国际潮流。无论是实业界还是学术界,都纷纷把企业看作“企业公民”,而不只是纯商业机构。

应该承认,限于时日,囿于经验,中国企业家对履行社会责任还处于蹒跚学步阶段,对自身的角色比较陌生,理解也难以深刻。相关的制度也尚不健全。在此情形下,“做秀”可以理解;只要不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出现一些不规范行为也无足深怪。然而,企业家的态度真诚与否,公众有目共睹:经过近40年体制改革,财会、税收、招标等方方面面的制度框架也初步搭建,欲辨明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真伪虚实,也不再无处着手。

谈到企业家社会责任,许多人赞赏20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众多基金会。美国企业家精于“散财之道”无非两个原因,一是物质基础,一是思

想基础。正是在美国经济崛起之时,企业家纷纷投身教育,重视科研尤其是医学科研,助力社会改良和扶贫。格外值得重视的是其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如法律规定公益捐赠享受免税待遇,同时必须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督,基金会的财务必须向全社会公开。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迫使企业家把钱花在明处、实处。中国也应在制度上吸取其优长,特别是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不能仅靠道德自觉或意识灌输,只有不断完善制度安排,搞对激励机制,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才能超越“做秀”“公关”层次,脱虚向实。

说到底,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履行社会责任最现实的选择,是结合企业自身定位来实现社会效益与经营效益的双赢。这就要求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和“痛点”。比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自“九五”时期便提出转型,却长期难以实现根本转变。本届政府为此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企业就应当全力开发新技术、新

模式、新业态。在供给侧改革中,把“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目标落实到每家企业身上,可能是目前中国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在这方面,阿里巴巴集团的实践值得重视。日前,马云在致股东公开信中提出,当电子商务变成“传统商业”时,我们希望为未来打造的是新经济成长的基础设施。他强调,“阿里巴巴是一家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的公司。”诚然,阿里巴巴面临巨大的挑战,它的面前没有任何参照,但其强烈的探索精神、社会担当是值得肯定的。

与阿里巴巴相似,当今中国优秀的企业均在致力于服务消费者,赋能上下游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有出息的中国企业家不甘心只当守财奴。不久前,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有关完善产权保护的意見。这项事关市场经济制度支柱的重大决定,为企业家吃下了“定心丸”,势必大大激发中国企业家从事“创造性毁灭”(经济学家熊彼特语)的激情,履行好自己最实实在在的社会责任。(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

“争相报考保卫处”没啥不正常

■试说新语

本报评论员 姜士强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017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上报名正式开始,对于“国考”的议论也逐渐升温。一个广为流传的消息是,报名首日竞争热度最高的职位来自辽宁储备物资管理局的保卫处,超过50人竞争一个岗位。

看看网上的相关言论,人们对同样的新闻却有截然不同的解读。有人说,连并不高大上的“保卫”都有这么多人去抢,说明年轻人求职越来越理性;也有人说,这恰恰证明官本位意识强烈,人才被“国考”掐尖的现象值得担忧。听起来都有道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且不说报名期还有好几天,发生什

么变化都未可知。退一步讲,就算是每个职位都“百里挑一”,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静下来看,国考之所以备受关注,与其规模效应密不可分。1.5万个职位同时面向全国招考,同一时期报名,同一时间考试,应聘者扎堆是很自然的事。看看那些大型的招聘会,有些还只是地域性或面向某一领域的人才,往往也能迎来人头攒动的场面。不仅如此,各种资格证书考试,就比如刚结束不久的司考,从各个考点也能体会到“国考”般的热度。换句话说,如果将国家公务员考试拆解开来,各机构部门采取单独招聘的形式,未必还能制造眼下这种所谓的轰动效应。

再说竞争热度,也就是报名与招考人数的比值,也很难说明什么问题。前些年就有人

通过报名人数减少推出反腐奏效的结论,还用来给“官不聊生”佐证。然而,事实证明,报名人数减少的背后是招考岗位的减少,同时,很多岗位根据需求更精准地设置了门槛,这与反腐工作谈不上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如今50多人竞争一个保卫处的岗位,同样没有多少解读空间。要知道,很多企业职位的招聘能够达到甚至远远超过这个热度,笔试、面试等一轮轮下来,最终被录取的那个人也是“过五关斩六将”了。

社会发展到今天,各级公务员考试,都应该“降温”了。这里说的“降温”,并不是说无人报考,毫不关心,而是社会公众要以更理性的态度去看。纵观这些年来的国考,从招考职位介绍上也能发现变化,专业不限的岗位越来越少,绝大多数

对学历、专业、工作年限等有着明确的要求。这就反映了一点,尽管“择优录取”原则没有变化,但岗位竞争更倾向于选择“合适的人”。这是行政效能提高的必然要求,也符合优化人才配置的规律。

由此看来,对待公务员考试,尤其层级较高的统一考试,人们更应该绕过统一招考的规模效应,避免择业就业乃至观察社会的视角被“假象”所扭曲。回顾往年的“国考”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参与报名纯属凑热闹,甚至抱着买彩票的心理,难怪每年总会出现大批报名者弃考。对于弃考者个人而言,顶多亏了几十元的报名费,但这背后又不知浪费了多少因组织统一考试而动用的社会资源,也不知有多少人出于从众心理也给这份热度添了柴火。

■媒体视点

人的工作不到位 老让“系统”背黑锅

银行不能缴费,医院不能挂号,政府服务窗口不能办理相关手续,证券公司不能交易……近来,每每遇到该办的事儿办不成、办砸了或者办得慢,相关部门或单位往往会把原因归结为“系统问题”。

当今社会的正常运转,越来越依赖各种“系统”。尤其在金融、信息等领域,离开互联网和电脑系统几乎寸步难行。然而,“系统”并不完美,正如IT行业里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不存在漏洞的系统。”

司空见惯的“系统问题”,不能成为相关部门将责任一推了之的借口。因为不管何种“系统”,都是由人设计、管理和操作的,“系统问题”责任源头在人。“系统”出现问题,即使表面看不是人为之过,也必须由人来负责。

如果总让“系统”背黑锅,轻描淡写地把工作中的不足归为“系统不稳定”“系统出错”等等,只能助长相关部门责任意识缺失,让消极应付的工作作风蔓延成灾。如果有朝一日,“系统”智能到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和表达,想必也会为自己鸣冤叫屈。

在离不开“系统”的年代,相关部门不仅需要把对“系统”进行不断检测和完善,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在“系统”运行层面,还应建立完善的流程和制度,厘清责任关系,严格落实各个操作环节的责任人。只有从人入手,将系统的错误视作人的过失,才能有效修正“系统问题”。

防火工作中有个要求,对于防范和解决“系统错误”有着极大启示:“人防是基础,技防是手段。”只有将“人防”“技防”连为一体,形成一个全方位的运行体系,才能做到系统少出错,人员不失责。(据新华社10月16日电,作者高健钧)

■本版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